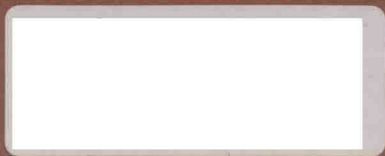


漆石匯
陳晶考古文輯

○ 陈晶 著

○ 常州博物馆 编

○ 下 册



上架建议：文物 / 考古

ISBN 978-7-5010-4562-4



9 787501 045624 >

定价：188.00 元（全二册）

○陈 晶 著 ○常州博物馆 编 下 册

漆石汇
陈晶考古文辑

目 录

第五辑 师道风范

缅怀业师柴德庚	379
检牍读札感师情	382
考古女杰曾昭燏	388
羨煞双师不老情	394
忆梓翁	398
学问闪光人品亦闪光	
——怀念前辈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	402
郑和纪念漫思	404
唐大诏令集补编与朱季海序	407
漆器修复专家吴福宝	411
中华第一梳之出土与复原	
——敬业者文物修复高手潘承琳，制图专家张孝光	415
漆线在心艺无止境	
——笔敬漆线雕大师蔡水况	417

第六辑 话常州

李伯元的篆刻和绘画作品	423
半世等飘蓬 命短诗偏寿	
——记清代诗人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展览	425

常州近园

——一座清初承晚明风格的古典园林 427

恽南田的笔墨友人

——康熙壬子年恽南田会王石谷、笪重光于毗陵讨论笔墨之作 429

太平天国在常州的史述调查记略 434

寺墩遗址首次出土良渚文化玉琮、璧 442

南朝四美侍女图 446

王世襄与常州竹刻 449

第七辑 书信珍藏

一 考古求学

苏秉琦先生书信	457
石兴邦先生书信	482
安志敏先生书信	488
佟柱臣先生书信	491
杨子范先生书信	492
刘敦愿先生书信	496
郭大顺先生书信	499
于中航先生书信	505
吴汝祚先生书信	516
冯普仁先生书信	526
汪遵国先生书信	530
商志蘅先生书信	534
曾骥先生书信	539
李文杰先生书信	541
王开发先生书信	542
宿白先生书信	544
严文明先生书信	545
李步青先生书信	546

李纯一先生书信	547
陈淮先生书信	549
游修龄先生书信	550
黎家芳先生书信	551
邵望平先生书信	553
王劲先生书信	554
中村慎一先生书信	556
黄建秋先生书信	557

二 髻饰研究

王世襄先生书信	559
吴福宝师傅书信	581
胡继高先生书信	593
殷玮璋先生书信	595
汪庆正先生书信	596
韩伟先生书信	598
傅举有先生书信	599
陈振裕先生书信	601
李汝宽先生书信	603
李经泽先生书信	606
胡世昌先生书信	611
范尧卿（遥青）先生书信	612
朱茵先生书信	617
刘安平先生书信	619
林星儿先生信	620
赵祥伦先生书信	624

三 学者信录

柴德赓先生书信	625
谢辰生先生书信	627
夏鼐先生书信	629

沈从文先生书信	630
黄景略先生书信	633
罗尔纲先生书信	635
谭其骧先生书信	637
史树青先生书信	639
刘乃和先生书信	642
王健群先生书信	643
陈从周先生书信	645
吴祖光先生书信	648
黄苗子先生书信	649
魏绍昌先生书信	651
蒋赞初先生书信	657
邓瑞先生书信	658

四 编辑来函

沈玉成先生书信	659
童明康先生书信	664
吴铁梅先生书信	666
周成先生书信	668
朱启新先生书信	669
杨泓先生书信	674
阎中雄先生书信	676
马力先生书信	677
杨瑾先生书信	678
张浣云先生书信	679
马孟晶先生书信	680

第八辑 信札手稿

苏秉琦先生信札	685
石兴邦先生信札	692

安志敏先生信札	696
杨子范先生信札	698
宿 白先生信札	699
郭大顺先生信札	700
王世襄先生信札	703
吴福宝先生信札	715
李汝宽先生信札	717
范尧卿先生信札	718
陈滋德先生信札	721
柴德赓先生信札	722
谢辰生先生信札	724
夏鼐先生信札	726
沈从文先生信札	727
罗尔纲先生信札	734
谭其骧先生信札	735
史树青先生信札	737
陈从周先生信札	738
沈玉成先生信札	739
童明康先生信札	742
朱启新先生信札	744
马 力先生信札	746
后 记	750
编后记	751

第五辑

师道风范

缅怀业师柴德庚

前些时，在报纸上见到舒芜（方重禹）老人又在健笔写文章，勾起了我对业师柴德庚（字青峰）先生的无限缅怀。柴师与舒芜先生在抗战的大后方是天天共剪窗烛、围炉夜谈的挚友，如今天上人间已经分别三十余载了，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柴师是我国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得意门生。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学术氛围浓厚的北京，只身南下苏州，创办江苏师院历史系（我是历史系第一届毕业生）。他以饱满的精力投身繁重的创业工作，以炽热的情怀教书育人，多年来他的简陋的书房里总是高朋（学生）满座，前来向他讨教学问，我是感同身受的亲历者。

第一次见柴先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在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维格堂前的大草坪，其时正是历史系的初创时期，他忙得不可开交，正与人交谈工作，我怯生生地走过去，他和蔼地询问：“是找我吗？有什么事，说吧。”我诉说，因病休学在家，身体已基本恢复，想转学到这里来改学历史。当时，大学生转校、转专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柴师却十分理解我的复学心情，同意让我试读。这一锤定音，烙下了我一生从事史学、考古研究的脚印，也掀开了我们几十年的师生情谊。

我刚入学时，柴师只身住在校内一所极普通的二层楼房里。一张床、一张书桌，最引人注目的是环壁皆书，羡慕我们这些刚涉世的学子。但这满架的书籍确实不是装饰品。是柴师亲自从书架上一本又一本抽出来，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做笔记、如何做卡片。如果说我后来在考古研究中做出了一些成绩，正是在柴师耐心的指导下，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毕业后，我从事文博考古工作，很多东西需从头学起。一时思想很不稳定，常给柴师写信，他总是忙里偷闲地给我复信。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鼓励我坚持下去，他不但在精神上扶持，而且热情地给我介绍导师。他

有个老同学苏秉琦其时已是考古界著名学者，有一次，我们在北京相遇，他专门带我去见苏教授，恰恰苏先生外出，柴师坚持要我等待。见面时，他诚恳而谦虚地对老同学说：“这个学生现在学考古，我教不了，请您收下吧”。

真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柴师一生除了读书做学问，生活上很俭朴，刚到苏州时，他在学校后门外桥下一个小饭店里吃包饭，有时我晚饭后去柴师住处，问起他：“吃过晚饭没有？”他这才想起来，急急匆匆赶去包饭馆。伙食很一般，他曾经对饭店老板称道家乡诸暨豆腐很好吃，经此一说，差不多每天都给他烧一个豆腐做的菜，有时吃到酸的豆腐，柴师不嫌好坏，都能对付过去。唯一的嗜好是饮茶，为此，他的朋友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曾为他作过一首《茶酒论》，其间有：“先生读史不知倦，亘亘揣摩到亘半。蝇头小字忽跳行，朱笔眉批渐零乱。此时正要碧螺春，建牙为子策奇。”这是对柴师喜爱苏州碧螺春的真实写照。

1963年春上，柴师应翦伯赞副校长邀请，自苏州北上赴北京大学讲学，适逢我出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整理一批考古资料。柴师住北大，我在城里，星期日我总去看望老师。有次正逢郑天挺先生的儿子儿媳也去柴师处，说是他们母亲特命送上一些好茶叶，由此引发了柴师的抱怨：虽然住在北大专家招待所，但暖瓶里的水经常冲不开茶叶。提起品茗，柴师的兴致来了，很是神往地回忆起当年在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情景。他说，国难当头，他们流亡大后方，在白沙，生活极其清苦，但是文化氛围却很浓。那时他与舒芜贴邻而居，朝夕相聚，两人每晚都秉烛夜谈，在一个小炭炉上用陶壶烧开水冲饮，每壶恰好两碗，再沏再烧。谈话的题材自然海阔天空，议论时弊、展望未来、治学研究、教学心得。彼时他们都很年轻，很有点“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饮到陶然自得处，诗兴的激情也来了，便相互作诗唱和，在国难中唱出爱国抱负与诚挚友情。那时，我还没有阅历，也反感忆苦思甜，虽然言者感慨万端，听者并不感动，只是感觉出柴师与舒芜先生的友情甚笃。

当时，我在济南工作，常去山东大学旁听史学史课程，并替山大郑鹤声教授抄写及校对有关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文稿。柴师告诉我，他与郑先生是诸暨同乡，同在白沙执教时，有一次学校“风潮”中，他们意见相斥，所以老乡相见并未泪眼汪汪，反而有点分外眼红，以致离别时在码头相遇，也各行其道，相互不理。但当柴师得知郑先生应香港三联书店相约，正在修订书稿时，立即将他读过的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后面刻录的郑和《题

记》用中华书局稿笺五页，按刻本格式原原本本抄下来，让我转交郑先生，并告知刻本与资料收藏之处。把做朋友与做学问截然分开，柴师的这种精神风范真是让我感动与景仰。

柴师为苏州的文化建设、教育事业做出了呕心沥血的贡献，可是时代却给了他以怨报德，特别是“文革”，山雨欲来，他成了苏州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历尽精神与肉体的磨难，1970年在农场劳动改造时英年早逝，一座青峰被压城的乌云吞噬了。直到1979年，柴师的沉冤才昭雪，我们来到苏州胥门外先师的墓地（其实已成荒冢），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曾发掘了数以百计古人类的墓葬，难于设想的是会去清理今人的墓葬，而且正是我冤狱沉沉的恩师。当我亲手清理出先师遗骨时，如雨的泪水滴在骨殖上，难道算是涌泉相报吗？但值得欣慰的是，先生的遗骨放在苍天之下，终于能够看一看阳光灿烂、春回大地了。

柴师一生不但治史学，也精诗词、擅书法，舒芜先生称道：“青峰做得一手很像样的放翁一路的诗，写得一手很像样的二王一路的字。”前些年，先生次子邦衡兄特地送我在香港出版的《柴德赓教授纪念册》及《柴德赓书法选》，其间收集了不少柴师笔力苍健的诗词手迹。在国难当头的岁月，用诗来表达忧国忧民的心迹、志同道合的情谊，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在柴师和舒芜先生之间也演绎得淋漓尽致。1947年春，两位患难之交在京重逢，柴师把当年的峥嵘岁月与煮茶唱和、以诗言志的情景都浸润在他的赠诗中：

四郊多垒日，飞絮满长天。

紫寒春无迹，江乡梦似烟。

剧谈吾可读，豪饮子宜先。

珍重平安意，绸缪万里缘。

这份情谊确是刻骨铭心的，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洗礼后，我也终于理解了柴师当年对这份情谊的眷恋与珍惜。今天，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在盛世年华中成长的年轻人对半个多世纪前的世事已经感觉迷茫，很难去体会当年这份苦难、这份情谊了。正因为这样，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才更值得我们去记忆、去珍惜、去弘扬的。

（原载于《苏州杂志》2004年第5期）

检读札感师情

我聆受苏秉琦先生的教诲已有二十多年了。老师立身于推进中国考古的研究，追求考古学发展的一片赤子之心，是十分使我敬佩的。关于苏先生，以忠厚的师长品德，追求真实性的学术道德和科学方法，教育培养新一代考古工作者，我更有切身感受。当此苏秉琦先生八十大寿，重温二十余年苏先生给我的书信，回顾二十余年他对我工作的扶持、教诲，并以此表示我对老师的敬仰与祝贺。

一、启蒙于大汶河畔

1959年我从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济南市博物馆工作。当时，大汶口遗址发掘工作完成，面对一箱箱陶片，一组组盆盆罐罐，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如何工作。我给母校我的史学老师柴德赓写信请教。事情是那样的碰巧！柴老师回信鼓励我，不要气馁，并举称：他在师大读书时，老同学中就有一位是现在著名的考古学教授——苏秉琦先生，他也是从学历史转入考古研究工作的。以后有人说：苏先生闭上眼睛摸陶片，真是深奥莫测！还有人说：他编著的《斗鸡台》报告，对鬲的研究，分型分式方法，时代发展关系，虽则几十年来新资料多了，但无法推翻他的排列，主要在于其研究方法的推理性及逻辑性。我有幸被分配参加大汶口墓葬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而更为有幸的是当我初事考古工作，就有机会得到苏先生直接指导。

20世纪60年代初，编写大汶口墓葬发掘报告的有杨子范同志、蒋宝庚和我三人，当把材料整理完成后，将做深入研究时，得到苏秉琦先生对我们初步工作的肯定与鼓励。认为我们应用器物分类学的方法，抓住典型器物陶鬶以及指搯水壶两类器物的分型分式是正确的。这时期，山东的生活很苦，苏先生每来济南，同他的研究生郭大顺同志住在简陋的办公室，一住就是十天

半月。与我们一起，一件一件摸那些盆盆罐罐，他启示我们研究方法，分辨在形态演化过程中，制作方法同形态特点的联系。他也肯定了对大汶口墓葬进行分类、分期研究，并又进一步启示我们以此探索社会关系及变化的深度。指出：关键是对材料的深入研究及深刻理解。当时，他正在进行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研究，他以自己的研究认识指导我们写报告。1963年春上，我同于中航同志一起到北京，补写、核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四座墓葬及部分器物的材料，以后，我又留在考古所与张孝光同志商量典型墓葬成组插图的绘制工作，每有问题，我总是去请教苏先生，他亲自一一过目，斟酌插图的编排，帮助我解决很多具体问题。有一天，他又约我，抱着一大捆的插图，去北京医院，让我向夏鼐所长汇报大汶口报告的编写工作。绘制的插图，摊满夏所长病床上，他们一起研究商量。苏先生治学的谦虚态度，多方请人提意见，愿意听取同辈专家的意见，这种认真的精神，是我亲眼所见，真可感人。那天，离开北京医院时，大街上已是万家灯火，我看苏先生捋起手腕看表时，露出似乎歉意（在医院的时间太久了）的微笑，我会意地笑了。我暗自庆幸，自己从懵然无识，在起步之初有机会就得到苏先生的指导和具体帮助，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马家浜里探序列

1964年夏，我由济南回到家乡江南，到常州市博物馆工作，馆里只有五个工作人员，藏品少得可怜，我形容它是袖珍博物馆。苏先生知道我的困境，他热情地通过书信，清楚扼要地指导我的工作。

在他的鼓励下，一方面我仍然进行了大汶口遗址与邻近苏北地区遗址的探研。在此同时，我开始了圩墩遗址的调查工作，发现这个遗址包含着不同时代遗物。1966年2月苏先生给我的信中指出：“圩墩村调查材料，希望早日整理出来，不会画图，可以试着来，发表时可请这里技术室加工。像这类包涵不同时代遗址材料，最好还是有些共生关系或层位关系才好，否则专就器物形制分析，总是吃力不讨好的。”自此以后，一场“文革”，八载阻隔。1974年起才恢复中断了的指导。

1974年8月，苏先生给我的信中指出：“圩墩材料，想来是很重要的。长时间以来，我所考虑过，在长江下游江南一带，到底南京地区和太湖地区的

关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常州地处两者之间，也可以说是边缘地带。来信中提到，有同志认为马家浜类型即良渚前身，这意见，我认为是有理由的，因此我对草鞋山遗址的发掘感兴趣，南博同志曾几次带口信来，望我去看看，我想等有机会时去看看。”这个时期，苏先生正在进行全国境内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划分区系的研究。12月间他给我的信中又提到：“你十月信中谈圩墩材料，据我看（可能武断些）它可能说明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这一范围内是这一原始文化的西部边缘，为了说明它的这一特征，在工作中，还是命名为圩墩一期、二期。关于这一原始文化，我们业已有了苏州（草鞋山）、崧泽、嘉兴（马家浜）几处各自可以分为较为可靠的早、晚期诸大同小异的文化特征，它们既有区别于江苏南部南京地区，也有别于苏北，更有别于近期浙江余姚河姆渡年代接近诸遗存，因此，这一文化的诸方面轮廓算是初具规模了。”只要是向他请教，总是倾其所知，毫无保留。他具有一个领先者应有的最好品质。同时他是一位严师。1977年10月在南京召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在关于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序列、分期讨论中，意见有分歧。我急于表述我的意见，会后，写了一篇内容为探讨这一地区文化类型的分析与分期的稿子，请苏先生提意见。苏先生洞察到我的缺点，每有会意，不求甚解，以致不能透彻地认识问题，并批评了我，说：“你不赞成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提法，不赞成把阴阳营类型夹在马家浜文化与崧泽中层之间，怀疑马家浜源于河姆渡之说，是有道理的。但这又仅仅是概念，概念的东西不等于科学研究的结论，何况问题提出也值得商榷。”并严肃地指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不是一个肤浅的课题，如果停在表面，那就一文不值了。”既有严格的要求，又给予切实的帮助，为了启示、勉励我，他有时一口气就给我写上密密麻麻三四页信笺，讲授考古学的方法论。

此后，我通过圩墩遗址三次发掘材料，凭借文化层的叠压关系，选出这里最常见的、特征明显的腰沿釜，反复排比，找出它特有的个性及其从早到晚发展、退化的变化规律，并与同类遗址中同种器物比较，分辨出圩墩遗址是属于马家浜文化几个支系中的一个类型，而它的位置处在太湖流域西部边缘，因此，它又同邻近地区不同类型的文化发生一定的渗透关系。《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一文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苏先生指导我进行类型学方法论的具体实践。

三、太湖之滨新起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苏先生根据我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差异，把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个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是一个文化区。1979 年夏，他在山西等地考古点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给我一封信中提到：“回去后准备搞些跨省的学术讨论会。东北、西北、西南、中南都落实了。东南、华北没有。”东南太湖流域的考古工作，正是他十分关注的问题。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太湖流域自苏松、锡常至杭嘉湖各地的考古工作者都在各自范围内开展重点发掘工作，揭示了一大批重要的遗址，但是，依然存在着各打各的锣、各敲各的鼓，缺乏区域性的交流。而后又意识到了，需要更深一层地探索和提高学科的研究工作，以及对太湖流域考古文化的再认识。苏先生期望能以长江下游这一地区考古为课题，沪、杭、宁几个单位联合起来，举行“同行”间的学术座谈。当 1984 年夏，环太湖流域六个城市博物馆（常州、无锡、苏州，湖州、嘉兴博物馆和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及人类学研究者联合发起组织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展览，并筹备在嘉兴召开学术讨论会。苏先生得知我们的计划后，满怀深情地给我们写了信，给予我们切切实实的支持。10 月间我与冯普仁同志去北京向苏先生汇报，他不只是对开好这次会议提出具体要求，并且十分体谅我们工作中的困难，亲自帮助我们落实了会议经费。

时年，苏先生已 76 岁高龄，在北国南疆不停奔波。当时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起眼的“第三世界”小博物馆组织的“小型”学术讨论会，然而，苏先生却洞察到这里蕴藏着考古第一线干部的一股对学术追求的爆发力。他毅然到嘉兴参加会议。是时，天气骤冷，江南乍寒，北来的同志都感到不好受。可是，苏先生不辞旅途疲劳和身体的不适，在会议上和会议期间听取各地各单位同志汇报，乐此不疲地写出《太湖流域考古问题》提纲。他在会上讲话时，不仅称：“这个座谈会是一件有意义的创举，在于它是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专题性质上，它涉及的太湖流域既属自然地理范畴，又属于人文、历史的‘区系’范畴。”并且发人深思地提出：实践会证明，这一创举是有生命力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还强调：这次座谈会是太湖流域几十年